

## 《楞嚴經》翻譯與八世紀廣州佛教\*

湛如  
北京大學

**摘要：**《楞嚴經》真偽之爭，綿延千年，本文不對經典真偽進行考察，而是對其出現地廣州，在八世紀之時的佛教狀況進行一些關注。本文從廣州梵僧積聚之原因入手，考察梵僧積聚廣州及其活動的狀況，以期對這部經典出現地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認識。

**關鍵詞：**《楞嚴經》、廣州佛教、海上絲綢之路、梵僧

---

\*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印度古典梵語文藝學重要文獻翻譯與研究”（項目編號：18ZDA286）的階段性成果。

## 一、梵僧聚集的廣州

談及禪宗，《楞嚴經》這一部對禪宗影響深遠的經典，自然浮現在眾人腦海中。此經自譯出就獲得禪宗僧人重視，至永明延壽(904–975)、天如惟則(1286–1354)等人更是力推不已，眾多禪師紛紛為其做注<sup>1</sup>，但此經的真偽屢有爭端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智昇(活躍於8世紀初)在同一年撰寫的《開元釋教錄》(T. 2154)與《續古今譯經圖記》(T. 2152)中，對譯者的身份界定出現差別。本文無意介入千古謎團的探索，在此探討的問題是：為何這部經會選擇在廣州誕生？《楞嚴經》的主要參與者是般刺密帝(Pāramiti, 活躍於8世紀初)與房融(?–705)，因此本文選擇以八世紀的廣州，對當時的梵僧及文人進行一些考察。

為何《楞嚴經》會在廣州譯出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首先需要回顧廣州的歷史，自東吳黃武五年(226)，孫權(200–222在位)將合浦分出交廣二州後<sup>2</sup>，廣州一直是重要的港口，到唐代更是有“廣州通海夷道”之稱<sup>3</sup>，賈耽(730–805)的《皇華四達記》中詳細地記錄了沿這條路線航行的途次、航期等<sup>4</sup>，由此可見，廣州是外國人從海上入唐的重要港口，佛教也隨著這些商人傳入中國，近現代從梁啟超(1873–1929)到鄭彭年等人，甚至認為佛教從海路傳進中國的時期比

<sup>1</sup> 楊維中《論〈楞嚴經〉佛學思想的特色及其影響》，《蘇州鐵道師範學院院報》，2001年03期，第75頁。

<sup>2</sup> 曾昭璇《宋代以前廣州城歷史地理》，《嶺南文史》，1984年04期，第65頁。

<sup>3</sup> 《新唐書》卷43，《地理志七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，第1146頁。

<sup>4</sup> 《新唐書》(前揭)，第1146頁。

從陸路更早<sup>5</sup>。正因為廣州具有如此濃厚的佛教歷史背景，所以《楞嚴經》在廣州的誕生才成為可能。

八世紀廣州的佛教情形如何？在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中對天寶九年（750）的廣州有一段記載：

又有婆羅門寺三所，並梵僧居住，池有青蓮華，華葉根莖並芬馥奇異。江中有婆羅門、波斯、崑崙等船，不知其數，並載香藥珍寶，積載如山，船深六七丈。師子國、大石國、骨唐國、白蠻、赤蠻等往來居住。種類極多。<sup>6</sup>

這段文字為我們描繪出當時廣州的太平盛景，有帶著奇珍異寶的異國人，有來自深山老林的白蠻人，尤其是第一句：有婆羅門寺三所，並梵僧居住。這一句說明當時廣州擁有大量來自印度的僧人，以致於要單獨為他們建立寺院，令其居住。外國人在中國聚集一處，甚至形成了城坊，足見其多。梵僧東來，多為傳法，這些梵僧為何滯留在廣州，不前往佛學更興盛的長安或是洛陽？

對於這個問題，覃召文在《嶺南禪文化》一書中說，因當時的梵本經典多寫在貝多羅樹葉上，長途運輸不便，所以廣州成為翻譯中心<sup>7</sup>。此說法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觀察八世紀來華的梵僧，並非所有的譯經僧都停留在廣州，如金剛智（669–741）就從廣州去長安譯經<sup>8</sup>，

---

<sup>5</sup> 梁啟超《佛教之初輸入》，載於氏著《佛學研究十八篇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版，第32–33頁；吳廷繆、鄭彭年《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》，載《歷史研究》，1995年02期，第21頁。

<sup>6</sup> 《遊方記抄》卷1，《大正藏》第2089號，第51冊，第991頁下欄第12–17行。

<sup>7</sup> 覃召文《嶺南禪文化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2頁。

<sup>8</sup> 《宋高僧傳》卷1載：“聞脂那佛法崇盛。泛舶而來。以多難故累歲方至。開元己未歲達于廣府。勅迎就慈恩寺。尋徙薦福寺。”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，第711中欄第16–18行。

也有如蓮華（活躍於 8 世紀末）等從長安到廣州的梵僧<sup>9</sup>，可見需進一步考察梵僧滯留的理由。

## 二、守望故土的梵僧

眾所周知，印度是一個熱帶國家，普通人身上不需要多少衣物，從敦煌的壁畫即可看出這一點。僧人更甚，戒律中直接說“未來諸比丘若不耐寒，著此三衣足以御之”<sup>10</sup>，因此印度人的耐寒能力較差，史書記載，梵僧入長安，冬季之時，被凍得直發抖。而廣州因為地處亞熱帶，氣候與印度相差不大，不適應北方寒冷氣候的僧人往往滯留在廣州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

除此之外，廣州市重要的貿易港口，自《漢書》開始，就記載廣州“多犀、象、毒冒、珠璣、銀、銅、果、布之湊”<sup>11</sup>，到唐代隨著貿易興盛更是異寶紛呈，據今人研究，唐代的貿易材料眾多，除《漢書》提及的材料之外，還有龍涎、檀香、蘇合香等香藥，金銀器等高級手工藝品，鑛鐵等原材料<sup>12</sup>。這些材料，大多不可能留在廣州，最後都北上供皇室貴族享用，除了這些名貴的材料外，另外一些便宜的香料也會隨著商人的往來帶到中土，如胡椒等調味香料。這些香料是組成咖喱的重要成分，而咖喱是印度食物中常用的調味品。唐代

---

<sup>9</sup> 《宋高僧傳》卷 3，《唐蓮華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2061 號，第 50 冊，第 721 頁中欄第 15-25 行。

<sup>10</sup> 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20，《大正藏》第 1421 號，第 22 冊，第 136 頁上欄第 22-23 行。

<sup>11</sup> 《漢書》卷十《地理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 年，第 1670 頁。

<sup>12</sup> 劉有延《唐代廣州蕃舶數以及城區人口和蕃客數量估計》，《回族研究》，2015 年第 2 期，第 6 頁。

的胡椒全靠海外供應<sup>13</sup>，因此在廣州利於第一時間拿到原料。除此之外，許多原產於印度的蔬菜，也傳入中國，孫機的《中國古代物質文化》中記載，從魏晉至唐宋期間，傳入中國的蔬菜有茄子、黃瓜、菠菜<sup>14</sup>。材料的運輸離不開商人，與僧人類似，商人在廣州聚居，《廣州古代建築與海上絲綢之路》中提及，當時蕃客的聚居地多由他們自己建造，光塔就是一個見證<sup>15</sup>。除了建築之外，上文提及的飲食也受到商人的影響，眾多的外國香料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接受，有烹飪書籍中甚至特別強調“少入胡椒末亦佳”<sup>16</sup>，可見當時香料應用之廣。

廣州引起梵僧積聚，不僅是因為它是佛教從海上傳入的起點，也因為廣州的氣候與印度相仿，而貿易帶來的便利使得梵僧更接近家鄉。可以方便的吃到自己家鄉口味的飯菜，對當時遠離故土的梵僧來說，也是一種強烈的吸引。可以說，商人與僧人，對廣州的建築、飲食文化影響深遠。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，激發出梵僧來東土傳法的熱情，自魏晉南北朝開始，廣東的翻譯事業絡繹不絕，魏晉時期共譯出佛經 4 部，南北朝時期，共譯出佛經 25 部<sup>17</sup>。因為廣州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使其成為梵僧來中國的第一站，《宋高僧傳》中的一句小字批注真實闡釋了這種盛況：“印度俗呼廣府為支那，名帝京為摩訶支那也”<sup>18</sup> 在印度人眼中，廣州就是中國的一個代表。這

<sup>13</sup> 王賽時《唐代飲食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3年，第130頁。

<sup>14</sup> 孫機《中國古代物質文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16頁。

<sup>15</sup> 鄧其生《廣州古代建築與海上絲綢之路》，《廣東經濟月刊》，2003年1月，第35頁。

<sup>16</sup> 轉引自王賽時《唐代飲食》（前揭），第130頁。

<sup>17</sup> 徐強《魏晉南北朝廣東佛教的傳播與分布》，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9年。

<sup>18</sup> 《宋高僧傳》卷2，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，第718頁下欄第6行。

些積聚在此或者路過的梵僧主要進行什麼樣的活動？

### 三、僧人與廣州佛教文化發展

以下對八世紀有明文記載的外國僧人在廣州的活動進行一些考察。

中天竺掘多三藏（活躍於7至8世紀之交），在大足元年（701）到達廣州後，到韶關謁見六祖（慧能，638–713）<sup>19</sup>，獲得傳承後在中國雲遊，《聯燈會要》《五燈會元》中記載其曾與神秀弟子討論禪法。<sup>20</sup>

烏菴國彌伽釋迦（活躍於8世紀初）、極量（般刺蜜帝，活躍於8世紀初），不知二人詳細資料，《宋高僧傳》記載彌伽釋迦曾幫助極量翻譯《楞嚴經》<sup>21</sup>。

南印度金剛智，開元七年（719）攜弟子不空（705–774）到達廣州傳教，隨即被迎入長安譯經。<sup>22</sup>

北印度不空，開元七年隨金剛智抵達廣州，開元二十年（732）到達南海郡，在法性寺度人無數，後從南海郡出發，前往印度及獅子國，天寶五年（746）從印度回長安。<sup>23</sup>

<sup>19</sup> 唐《宋高僧傳》卷10載：“釋掘多者，印度人也。從踰沙磧，向慕神州。不問狄鞮，旋通華語，而尚禪定。徑謁曹溪能師，機教相接，猶弱喪還家焉。”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，第770頁中欄第6–9行。另參易行廣《佛教先傳入廣州所起的歷史作用》，《嶺南文史》第2期，第22–27頁。

<sup>20</sup> 《聯燈會要》卷3，《西天崛多三藏》，《卍續藏》第1557號，第79冊，第29頁下欄第7–13行；《五燈會元》卷2，《西域崛多三藏》，《卍續藏》第1565號，第80冊，第55頁中欄第10–17行。

<sup>21</sup> 《宋高僧傳》卷2，《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，第718頁下欄第4–11行。

<sup>22</sup> 《宋高僧傳》卷1：“開元己未歲達於廣府”。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，第711頁中欄第17–18行。

<sup>23</sup> 《宋高僧傳》卷1，《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》，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，第50冊，第712頁上欄第26–下欄第11行。

北天竺般若三藏(活躍於8世紀末),建中初年(約783)到達廣州,遭遇海難經論遺失,尋回後前往長安譯經。<sup>24</sup>

中印度僧人蓮華(活躍於8世紀末),興元元年(784)見德宗(779-805在位),在回印度之時,從德宗乞鐘一口,由廣州節度使鑄造並送其回國安置。蓮華回國後,貞元十一年(795)又托人帶回華嚴經後分梵本,由般若三藏譯出。<sup>25</sup>

以上這些梵僧的活動,除千古謎團的《楞嚴經》翻譯,有據可考的譯經僧都未在廣州翻譯過佛經,說明八世紀的譯經中心向長安和洛陽轉移,究其原因,先有玄奘從印度取回大量經典,獲得唐太宗支持在長安翻譯,後有義淨(635-713)、菩提流支(572?-727)獲得武則天(690-705在位)支持在洛陽、長安譯經,天下高僧紛從,因此廣州在七世紀之後,不復譯經盛況。但是廣州作為最早接納佛教的地點,其對佛教文化的吸收已經完成,開創出屬於自己的獨特文化氛圍,在八世紀這段時間達到了頂峰。其中慧能一系在廣東傳播禪法,乃至掘多三藏都從他學習禪法,此事表明,印度僧人由最初的傳法,開始轉向傳法、學法並行的方式。

禪宗初祖達摩(?-535)在廣州登陸建立西來庵,他見南方之人重義理輕禪教,北度至魏大興禪教<sup>26</sup>,六祖慧能為何又選擇廣東自己弘揚禪宗?從達摩到六祖,中間近200年,在印度僧通過海路到達廣州譯經弘法之時,許多中國僧人也從廣州出發前往印度求法,義淨

---

<sup>24</sup> 《宋高僧傳》卷2,《唐洛京智慧傳》,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,第50冊,第716頁中欄第3-13行。

<sup>25</sup> 《宋高僧傳》卷3,《唐蓮華傳》,《大正藏》第2061號,第50冊,第721頁中欄第15行-下欄第2行。

<sup>26</sup> 《續高僧傳》卷16,《菩提達摩傳第五》,《大正藏》第2060號,第50冊,第551頁中欄第27行-下欄第1行。

(635-713)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(T. 2066)中記載，從貞觀十五年(641)到天授二年(691)四十年期間，前往印度求法僧人總共 60 位，其中經海路前往者 38 人，佔據 63% 比例。不僅當時的中國僧人紛紛前往廣州，想從此處出海前往印度，眾多從印度前來的僧人也從想從廣州回國，除上文提及的蓮華，僧傳中《楞嚴經》的攜帶者也是在經典翻譯完成後泛舟回國。廣州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，成為中國僧、梵僧往返中國的重要支點，這些僧人，大多都是當時名動一時的人物，他們在廣州的停留，必然會為廣東的佛教文化帶來巨大的影響和發展。

除了佛教僧人前往此處給廣州帶來豐富的佛教文化同時，唐朝被貶至廣東的文人也比比皆是，根據劉慶華《廣東貶謫文人的時空考察》中的列表，統計可得出，整個唐朝有名可考貶至廣東的文人有 126 人，其中出名者如韓愈(768-824)、劉禹錫(772-842)等人，乃至《楞嚴經》的筆授房融(?-705)也是其中一員<sup>27</sup>，其餘默默無聞者更是比比皆是。這些人當中，有《新唐書》中稱贊“擢下筆成章科”的王無競(652-706)<sup>28</sup>；有尤擅吏術，官拜廣州刺史、嶺南節度使的崔珙(?-854)；還有同為廣州刺史，膽大心細的劉崇龜(活躍於 9 世紀末)<sup>29</sup>。這些文人的到來為廣州的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他們對廣東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，到了唐玄宗之後，再也沒有人被流放到廣州<sup>30</sup>，就是因為廣州當時不再是一個不毛之地。

---

<sup>27</sup> 劉慶華《廣東貶謫文人的時空考察》，《嶺南文化》，2009 年 05 期，第 155 頁。

<sup>28</sup> 《新唐書》，卷 107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 年，第 4078 頁。

<sup>29</sup> 《新唐書》(前揭)，卷 90，第 4664 頁。

<sup>30</sup> 劉慶華《廣東貶謫文人的時空考察》(前揭)，第 157 頁。



正是僧人、文人、商人三者結合起來帶來的自由與寬容，造就了廣州獨特的文化，這種文化又對後來的嶺南禪文化造成了巨大影響。

#### 四、後論

總而言之，以《楞嚴經》翻譯一事為契機，考察八世紀的廣州佛教背景，可以發現，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廣東，從世界各地帶來了各種香料、蔬菜，為在這裡生活的梵僧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，航路的通暢也令他們能夠較為方便的回國。此外，廣東的氣候與熱帶氣候的印度相接近，這也是許多梵僧選擇滯留廣州的一個重要因素。經過歷史上眾多高僧在此譯經傳法，八世紀的廣州，由譯經中心逐漸轉型為傳法中心，眾多求法高僧的駐足，令廣州乃至周邊佛教文化迅速發展。被貶文人對廣州的文化發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，這些條件綜合起來，形成《楞嚴經》傳譯的重要條件，所以《楞嚴經》在廣州出世也不足為奇了。

#### 參考文獻

##### 原始文獻

《五燈會元》20卷，普濟（活躍於13世紀中葉）於1252年編纂，《卍新纂續藏經》第80冊，第1565號。

《宋高僧傳》30卷，贊寧（919–1001）等編纂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冊，經號2061。

《新唐書》225卷，歐陽脩（1007–1072）等於1060年編纂。北京：中

華書局, 2012 年。

《遊方記抄》1 卷, 慧超(704-787)等撰,《大正藏》第 51 冊, 經號 2089。

《漢書》120 卷, 班固(32-92)等編撰, 北京: 中華書局, 1982 年。

《廣東通志》334 卷。阮元(1764-1849)等於 1822 年編纂。南京: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, 1986 年。

《彌沙塞部和酰五分律》30 卷, 佛陀什(活躍於 5 世紀初)等於 423 年譯,《大正藏》第 22 冊, 經號 1421。

《聯燈會要》30 卷, 悟明(活躍於 12 世紀末)於 1183 年編纂,《卍新纂續藏經》第 79 冊, 第 1557 號。

《續高僧傳》30 卷, 道宣(596-667)於 645 年編纂,《大正藏》第 50 冊, 第 2060 號。

### 東亞語研究

王賽時《唐代飲食》, 濟南: 齊魯書社, 2003 年。

吳廷繆、鄭彭年《佛教海上傳入中國之研究》,《歷史研究》, 1995 年 02 期, 第 20-39 頁。

易行廣《佛教先傳入廣州所起的歷史作用》,《嶺南文史》02 期, 第 22-27 頁。

孫機《中國古代物質文化》, 北京: 中華書局, 2014 年。

徐強《魏晉南北朝廣東佛教的傳播與分布》, 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, 2009 年。

梁啓超《佛教之初輸入》, 載其本人著《佛學研究十八篇》,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1 年版, 第 21-39 頁。

曾昭璇《宋代以前廣州城歷史地理》,《嶺南文史》, 1984 年第 1 期,

第 55-69 頁。

覃召文《嶺南禪文化》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6 年。

楊維中《論〈楞嚴經〉佛學思想的特色及其影響》，《蘇州鐵道師範學院院報》，2001 年 03 期，第 70-76 頁。

劉有延《唐代廣州蕃舶數以及城區人口和蕃客數量估計》，《回族研究》，2015 年第 2 期，第 5-13 頁。

劉慶華《廣東貶謫文人的時空考察》，《嶺南文化》，2009 年 05 期，第 154-158 頁。

鄧其生、曹勁《廣州古代建築與海上絲綢之路》，《廣東經濟月刊》，2003 年 1 月，第 35-37 頁。

